

清代移民共同体的形成与基层社会治理

——以萍乡市银子窝万寿宫为例

徐莉莉¹, 凌 焰²

(1. 湖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00; 2. 萍乡学院 人文与传媒学院, 江西 萍乡 337000)

摘 要: 明清时期, 闽粤赣地区客家人大量外迁造成的大规模人口流动瓦解了地方基层治理秩序, 移民社会的治理成为基层治理体系重建的重要内容。清代萍乡的传统基层社会治理主要依赖图甲组织来实施, 图甲组织的破坏亟需基层治理体系的重建, 而移民群体却被排除在重建后的图甲治理体系之外。为了实现对移民群体的治理, 清政府在移民群体自发形成的“移民共同体”银子窝万寿宫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图甲秩序, 维持了萍乡地方基层社会秩序的稳定。

关键词: 移民共同体; 万寿宫; 基层社会治理; 图甲组织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9249 (2025) 01-0067-05

DOI: 10.20229/j.cnki.2095-9249.000055

明清时期, 长期的战乱使闽粤赣地区的民众四散, 逃亡现象严重, 造成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原属于里甲编户的流民脱离了里甲体系, 成为流民或者流寇, 闽粤赣交界地区也因此成为主要的流民集聚区之一^[1]。这些流民被当地土著居民称为“客家人”^[2]。遵宣三图地区位于萍乡和宜春交界, 是移民进入的重要地区。移民群体大肆涌入造成遵宣三图地区里甲组织的严重破坏, 在重建基层治理体系的过程中, 移民群体的治理成为当地政府无法回避的问题。

万寿宫是江西人建立的、以“福主”许祖真君为主神的祭祀场所, 也是清代旅居各地的江西人以许祖真君信仰为纽带而建立的同乡联络场所, 是江西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学界对万寿宫与社会治理关系的研究已有大量成果, 但是大多数学者着力于万寿宫宗教信仰的教化功能或将万寿宫作为商业会馆研究其对移民群体内部的自治功能, 如黄德锋^[3]讨论了古代国家借助万寿宫信仰的道德教化功能对社会治理的作用。何晶^[4]从区域史的角度阐述了许真君祭祀圈对农村村落共同体的整合作用。在移民自治方面, 何炳棣、窦季良、王日根等学者都做过较深入的研究, 其中窦季良^[5]指出: 会馆作为商业行会和同乡组织具有地方凝聚作用; 何炳棣^[6]把会馆当作移民史的索引, 强调移民在外乡以会馆为纽

带的自治功能。通过梳理已有研究成果, 笔者认为在万寿宫参与乡村社会中移民治理的具体案例方面还有一定研究空间。

萍乡市银子窝万寿宫位于东源乡银子窝地区, 是由明清期间进入此地的移民群体建立, 承担着银子窝地区的移民社会治理职能。凌焰^[7]认为银子窝万寿宫是客家人供奉的神庙。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社会区域史的角度, 以《许祖真君会册》为核心资料, 结合家谱、口述等历史资料, 具体分析银子窝万寿宫“移民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过程以及其在萍乡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许祖真君会册》共有两本, 分别为同治己巳年(1869)和民国十年(1922)编纂, 其中详细记载了银子窝万寿宫成立原因、捐户世系居址、规章制度以及其翻修记录, 是研究银子窝万寿宫与当地社会治理情况必不可少的历史资料。

一、清代萍乡遵化乡宣化里三图基层治理秩序的破坏

萍乡市上栗县东源乡明清时期属萍溪县遵化乡宣化里一、二、三图辖境, 人们习惯上把东源乡分为三个片村: 以小枫滩庙(遵宣一祠)为中心的小枫、石源、民主、田心、石岭、天井等六村称为小枫片; 以江岭滩

收稿日期: 2024-08-09

基金项目: 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2020年)地区项目“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利用与廉洁建设研究——以萍乡市为例”(20DQ3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清代农家账簿中的乡村经济和社会史料整理与研究”(22&ZD078)

作者简介: 徐莉莉(2001—), 女, 河南商丘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明清思想史、社会史。

庙（遵宣二祠）为中心的江岭、东源、新益、桃源、莲溪等五村称为江岭片；以上埠雒庙（宣三雒庙）为中心的上埠、宫江、楼下、羊子、江北、逢源、竺塘、镜山、桥头、石塘等十村称为上埠片。本文研究范围为遵宣三图地区。

明清以来，闽、粤、赣地区发生大规模人口流动，造成社会动荡和基层治理秩序的混乱。大量移民的进入使遵宣三图地区族群关系愈加复杂，不断冲击着已有的图甲组织，加之明末清初以来兵祸频发，社会动荡，清政府恢复赋税原额后加大对民众的剥削力度，使户口流亡现象更加严重。总的说来，明清时期图甲组织的破坏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遵宣三图地区土著居民与移民呈现出土著聚居、移民散居的居住形态，造成土著居民抱团排斥外乡移民的现象，这种现象进一步加剧了土著居民和移民群体之间的矛盾。自唐代开始便不断有移民进入这片村落并定居于此，明代以前进入萍乡的何、彭、钟、周、刘、况六大姓于清代之前取得了萍乡本地户籍，以土著自称，是当地的土著大姓，又被称为图家。在当地有这样的称法：一甲潭头何、刘、况；二甲逢源周，三甲宫江何，四甲竺塘彭，五甲竺塘何，六甲江北钟，七甲楼下何，八甲竺塘彭，九甲石下彭，十甲桥头何^[7]。其中的一甲、二甲、三甲指的是遵宣三图的图甲组织名称，潭头、逢源、宫江等指这些族群聚居的地域村落。以下为明代以前进入萍乡的移民概况，此表根据部分族谱资料整理而成。

表 1 遵宣三图地区部分土著居民情况

姓氏	入萍时间	户籍	居址	资料来源
何氏	唐开元时期	遵宣三图五甲	竺塘	《萍北竹溪何氏族谱》
何氏	宋末元初	遵宣三图三甲	宫江	《宫江何氏族谱》
何氏	宋元时期	遵宣三图十甲	桥头	《萍北桥溪何氏五修族谱》
钟氏	元代	遵宣三图六甲	江北村	《萍乡永丰朗田儒族江北钟氏族谱》
周氏	元代	遵宣三图二甲	逢源	《萍北逢源周氏族谱》
彭氏	——	遵宣三图 四甲、八甲	竺塘	《萍北竺塘彭氏芳公支谱》
何氏	元代中期	遵宣三图七甲	楼溪	《萍北楼溪何氏族谱》
彭氏	元末	遵宣三图九甲	石溪	《萍北石溪彭氏族谱》

明末清初以来，不断有新的移民进入此地，散居在遵宣三图各处，这些移民虽入住萍乡地区，但是很难取得本地的户籍，就算是进入本地户籍系统，也还是被萍乡土著居民称为“客家”或“寄居”。如《萍北蔡氏续修族谱》记载“蔡氏始祖福粤公，当宋南渡时，由福建迁广东梅州松源村，至十七世祖善馨公，于清康熙初自广东携眷来萍。”而“凤窃念吾乡知识萌芽之时，隸籍畛域，客土暗分，最愚不察，又尚以来自粤东者为客，匕弱而主强也，沿惯成习，后嗣犹讳之”^[8]。可以看出清代遵宣三图地区居民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明代之前

进入萍乡的土著居民与明清时期进入萍乡的客家人。明清时期不断进入的移民群体在遵宣三图地区定居，展开生产生活活动，地方人口不断增加，新血液的加入使原本相对稳定的图甲组织受到严重冲击。

明清时期图甲组织破坏的另一个原因是明清萍乡地区户口逃亡现象更加严重。在明代沉重的赋役负担和各种赋役流弊下，袁州府的里甲（户口）流失问题一直存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以及清政府推行的催征赋税和恢复赋税原额政策，导致袁州府户口逃亡现象进一步加剧。这些赋役问题及户口逃亡对袁州府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图甲组织破坏^[9]。康熙《萍乡县志》记载“然萍自明季以来，兵火频仍，丁丑临蓝入寇，癸末张左交蹙，既经贼毁，又遭兵焚，继以乙酉鼎革时，袁署郭天才、楚黄朝宣闕杀于萍境，城郭圯墟，加之丁亥奇荒疫疠，白骨填途，青磷遍野，履道荆棘，田卒污莱，其时士民毙于兵、毙于馁、毙于病者，十有八九，所存一二遗黎，生活无计，相继逃亡，几无复烟火矣。”天灾人祸之下，萍乡“七乡计一百二十里，时仅编四十余里，且一里之中有仅存一递者，一递中有仅存一人者。乃设法招徕，渐次开垦”^[10]。《萍北竹溪何氏族谱》卷首《康熙十八年的重修族谱序》中记载的竹溪何氏宗族清初年遭受的严重破坏“后遭崇祯壬午、癸卯之荒，丁口十丧八九，一族仅存十余烟。至我朝康熙甲寅，又遭棚棚朱益吾勾引伪将破萍城，盘居两载，竹溪庐舍焚毁殆尽，族人因挈老幼，避于宜春沧下坊侨居。再寒暑，及丙辰二月内，幸安亲王躬率六军临萍剿贼，安抚流民，父老始故还土，复故业。而谱则重烬于水妃之灾矣。”^[11]

在移民涌入和户口逃亡的双重压力下，萍乡地区出现了严重的居民户籍所在地与实际居址分离现象。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整合散居各处的图甲组织成员，以共同承担赋役征派，成为地方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萍乡地区采取设立义图的方式，在图甲组织内部由各户捐资成立图会，对分散各处的图甲组织成员进行整合。萍乡知县顾家相曾言：“图有祠，甲有会”^[12]。其中的祠就是图甲组织的活动场所：义祠。居住分散的图十递人等定期聚集于义祠，对其中供奉的开籍祖先进行联合祭祀，并借此契机共同商议图内公共事务。由此可见，义祠不仅是祭祀场所，更是图会组织的重要表现形式和空间载体。同时，图甲组织也是划分族群界线的重要机制^[13]。东源乡三个片区均是以雒庙为祭祀中心，其中遵宣三图即上埠片以宣三雒庙为核心祭祀场所，该雒庙的管理权实际归属于遵宣三图的图甲组织。雒神祭祀活动以图甲组织中的“甲”为单位，实行年度轮值供祀制。祭祀活动的参与有明确的族群边界：只有图家享有参与权，客家群体则被排除在外。总之，

宣三雒庙不仅是图甲组织的祭祀中心和议事公所,还可作为族群区分的重要标识,它在有效强化图家群体的制度与情感联系,巩固族群凝聚力的同时,也将客家群体排除在遵宣三图地区的图甲组织管理体系之外,使客家群体仍处于相对自治状态。银子窝万寿宫的建立将移民群体联合成一个移民共同体,以会内条约的方式实现移民群体的内部自治,同时便于政府依托银子窝万寿宫对移民群体实施实际治理功能。

二、银子窝万寿宫的建立

遵宣三图地区图甲被组织破坏之后,地方政府建立了“义图”,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组织,其管理机构为图会,原祭祀场所“义祠”为图会的空间载体。然而,这一体系具有明确的族群界线,客家群体并无资格参与当

地祭祀活动和基层治理体系。清道光庚戌年间(1850),移民群体建立了自己的祭祀场所——银子窝万寿宫,“同庆局”为其组织机构。

据现有资料统计,银子窝万寿宫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开始筹建,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式建立,因“我等境内抱病甚众,凡扣真君者即愈”^[14]。为酬谢神恩,求神庇佑,银子窝地区数位倡首提议建立银子窝万寿宫,根据道光三十年(1850)《许祖真君记》记载,倡立银子窝万寿宫者有钟玉珊、黄良顺、蔡振铨、刘日升、林魁涛、刘有麟、何森云、林如诚、邓秉元、邓邦显等十人,此十人均定居于银子窝附近片村,且已经取得大安乡户籍。表2为银子窝万寿宫的倡首及其概况,根据道光三十年(1850)《许祖真君会册》整理而成:

表2 银子窝万寿宫倡首概况

姓名	民籍	住址	后代	身份
钟玉珊	大安乡二保二图四甲民	潭头	子 长龄、云龄、丰龄、华龄	
黄良顺	大安乡二保三图八甲民	摇橹窝	子 和懿	
蔡振铨	大安乡三保二图二甲民	双凤山	子 贵凤、贵凰、贵诚	国学生
刘日升	大安乡三保三图三甲民	——	子 家祥、家衿	议叙
林魁涛	大安乡四保一图三甲民	境山	子 瑞珍	议叙
刘有麟	大安乡四保一图三甲民	竹山塘	侄 兆余、兆森	
何森云	大安乡四保一图三甲民	槐田	子 国接	
林如诚	大安乡四保一图三甲民	——		
邓秉元	大安乡四保一图九甲民	石塘	子 尚斌、尚诚、尚廉	大学生
邓邦显	大安乡六保一图四甲民	尖嘴岭	子 万顺、万利、万道、万光、万石万林	

银子窝万寿宫修建和维持正常运行的费用主要来自移民群体内各户的捐输、捐资生息的累积以及一年两次的收租。道光三十年《许祖真君记》序文中记载:“今年夏,二三同志议倡斯举,踊跃乐输者接屋连檐,不周年得金三百有余矣”。同庆局会员入局方式为捐纳资金,并规定“捐钱十挂者为一户,五挂者为半户,至捐钱二三挂者,建庙之后一切事宜容再酌议。”获得“一户”身份的人有权轮流参与局内事务的决策和实行,有权参加银子窝万寿宫祭祀仪式并分得一定数量的花红,入局身份以同庆局收票为凭证。为防止捐户身份的冒认现象,银子窝万寿宫通过“订立捐册”的方式对捐户及其子孙后代的姓名进行系统登记。同时,同庆居收票管理程序严格,“查核捐户内有捐而遗失收票者,有更名而未换收票者,使不订立捐册,恐年垂久远,难免混入局内,与祭典饮,冒给花红。”且“日后如有寻出同庆图记收票,不准为用”^[14]。通过这种方式,移民群体募集了足够的建庙资金,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具有自治性质的“同庆局”,作为处理移民内部事务的组织机构。在同庆局的有效运作下,银子窝万寿宫成功建立。这不仅实现了移民群体祭祀空间的建立,也是遵宣三图地区移民群体整合和自治组织化的重要突破。在万寿宫运行过程中,募捐所得经费作为银子窝万寿宫捐户之公产,用

于购入银子窝万寿宫所需地亩田产。万寿宫下辖田亩山场庄屋丘峡等产业,由值年首事个人经营管理,所得财产亦归入万寿宫公产。同治八年(1869),银子窝万寿宫经理首事“邀集各姓,续行加捐”,万寿宫经历第一次重修^[15]。

银子窝万寿宫的建立是移民群体内部整合的重要转折点,在精神和现实两个层面都成为“移民共同体”。首先,在精神层面,银子窝万寿宫捐户皆为从外地迁入萍乡的“客家人”,本身具有足够的身份认同基础,且银子窝万寿宫作为移民群体共同的信仰空间,通过定期祭祀活动,强化了移民群体的文化认同感。其次,在现实层面,银子窝万寿宫作为移民群体的社会组织中心,通过局内条规约束会员实现对移民群体的组织和管理,将原本分居各处,缺乏联系的移民联结起来,使其在组织上由原本分散的个体演变为具有较高凝聚力的“移民共同体”。《许祖真君会册》记载银子窝万寿宫建立的原因“予等籍隶昭萍历有多载,掇芹折桂,家不乏人,因族众人繁,分居散处,寄居遵宣三图者多家……俟费盛,始行创庙”^[15]。进一步说明银子窝万寿宫的建立是移民群体由分散到整合的关键步骤,有力加强了移民群体的内部凝聚力。

总而言之,银子窝万寿宫是由移民群体共同捐资建

立、祭祀许祖真君的场所。其运行基础为各捐户捐资生息,置办产业以及收取的田租,这些收入构成了银子窝万寿宫的公产。各捐户轮流充当值年首事,共同管理万寿宫内各项事务。同样的移民身份和对许祖真君的共同信仰使银子窝万寿宫成为一个具有深厚精神基础和完备运行体系的移民共同体。它不仅是移民群体情感纽带的象征,还发挥着移民群体自治的作用。

三、银子窝万寿宫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参与

黄忠鑫在其研究中曾指出“官府往往是在特定事件的背景下整顿保甲和清查人户”^[16]。东源乡位于萍乡与宜春的交界地带,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此处社会关系错综复杂。以银子窝万寿宫为联系纽带的移民群体散居于遵宣三图地区,但其户籍大部分隶属于大安乡。由此可知,清末大安乡图甲组织突破了地域限制,造成民户“居在此,籍不在此”的现象。针对这一问题,地方政府依照地缘性原则,重新对基层社会治理组织进行编排。居址超出大安乡地域的移民群体被排除在大安乡图甲体系的编排范围之外,成为大安乡辖下并行于大安乡图甲组织的另一个独立群体,并依托银子窝万寿宫原有结构成立保甲组织,对移民群体实施管理职能。

首先,银子窝万寿宫自身治理能力的提升,得益于由首事、值年首事、倡首、总理以及捐户构成的多级式管理体系。所谓“首事”,即银子窝万寿宫的管理人员,也是万寿宫的主要决策者。据记载:银子窝万寿宫的首事团队由何森云、刘日升、邓尚斌、钟玉珊、蔡贵诚、林瑞珍、刘海帆、黄和懿、邓邦显、林成祥等十人组成^[17]。局内“值年首事”指当年负责万寿宫具体事务者,值年首事由筹办万寿宫时捐钱十挂者轮值,每年轮值人数为七到八人,后续捐户中有捐钱十挂者照前设位。“倡首”为最初倡立银子窝万寿宫者,道光二十八年(1848),为酬谢许祖真君神恩,倡首倡议捐立银子窝万寿宫,银子窝万寿宫共有倡首十人,每年轮值一人,十年轮值一届,倡首和首事人选基本重合。这些管理层级和捐户一起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银子窝万寿宫管理体系,为银子窝万寿宫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保障。

其次,银子窝万寿宫对移民群体基层治理的参与不仅依托于完善的管理体系,也取决于其内部各层级的分工安排。局内首事参与重要决策的制定并负责决策的把关和审核,如局内有续捐十挂者或新捐十挂者,需得到首事公议允许,值年首事不得私行擅收。值年首事和首事一起负责当年具体事务的决策和执行,具体说来,值年首事主要负责以下事务,首先,银子窝万寿宫一年需分两次收纳赋税,分别为七月初十日和十月初四日,称“上忙下忙”,粮银具体征收事务由当年值年首事负责。其

次,银子窝万寿宫每年祭期为八月十三日,祭仪由值年首事负责筹办。另外,值年首事每年需要选出殷实公正者一二人,负责总理局内钱谷出入数目,编立流水簿,以便事务的交接与审查。最后,值年首事负责局内粮田山林湖泊等财产的管理工作,如“局内各处山场正杂竹木,佃人看守蓄禁,若有修整改造,需要预先赴局告知,凭值年首事踏看”^[18]。由于馆内倡首和首事为同一批人,可以说他们共同承担了局内的监管人角色。银子窝万寿宫内部明晰的分工方式使各阶层人员各司其职,有利于银子窝万寿宫参与基层社会移民治理效率的提高。

最后,银子窝万寿宫对移民群体基层社会治理的实施,也体现在其对地方事务的参与。在清朝传统的乡村社会基层治理中,地方人口户籍的清查一般由代表官府的图甲组织负责,但是因遵宣三图地区移民群体脱离了图甲组织的控制,大安乡图甲组织无法有效清查移民群体户籍进而征收赋税,这一职能便由银子窝万寿宫代为实行,银子窝万寿宫成为实际上的保甲组织。在以银子窝万寿宫捐户为基础的保甲体系内,保长承担着“查造会内烟册”的职能,并规定“值年首事每年四月内将所造烟册一本交该图都保值年保正”^[17]。烟册是明代黄册制度实行以来继户贴之后的一种户籍册,着重于清理地方实际居住的各类人户户口。

同时,银子窝万寿宫还负责移民群体的赋役收缴和治安保卫。同治八年(1869)《许祖真君会册》中记载,“逐年查造册结,编立牌长,局内前仅数十户按灶添造,至三百余户,出册费难免滋扰,县宪谕令局内照依旧章,自行造册,酌给规费,册交保缴,结由亲呈,众甲息听自便”。且银子窝万寿宫需“每年雇请甲长五人,劝办公事乡差,并给发工钱。”这里的公事乡差主要指赋役的征派,间接体现出银子窝万寿宫承担了在移民群体中催征赋役的职责。银子窝万寿宫在户口清查和赋役征收方面的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图甲组织对移民群体管控的不足。除户口清查和赋役钱粮的征收以外,银子窝万寿宫还参与了移民群体的治安保卫活动。如“往岁逃匪窥境,患害交作,奉各宪示督办,团练费无从出,藉神费以资捍卫,嚣氛始息”^[19],表明本地往年遭匪患袭扰,银子窝万寿宫藉神费为团练费,参与地方保卫活动。

总而言之,银子窝万寿宫作为移民共同的祭祀组织,以许祖真君信仰为纽带,将遵宣三图地区的移民群体凝聚为一个整体,建立了一个以银子窝万寿宫为中心的移民共同体组织。在清末天灾人祸频发、社会动荡和社会基层秩序重建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将移民群体视为独立于图甲组织之外的社会群体,并以银子窝万寿宫为基础成立保甲组织,在移民群体内负责地方编造户籍册、征收赋役和治安维护等事务。有效实现了地方政府

和移民社会之间的联结与互动, 银子窝万寿宫也因此成为地方政府与移民群体之间的联结枢纽。

五、结语

明清时期, 闽粤赣地区的人口流动造成基层治理秩序的混乱, 遵宣三图地区移民群体处于当地图甲体系之外, 于是, 政府以由移民自发建立的祭祀组织——银子窝万寿宫为基础, 对移民群体实施治理。银子窝万寿宫位于萍乡与宜春交界处的遵宣三图地区, 清道光三十年(1850)由明末清初进入萍乡地区的外来移民所建, 是一个以许祖真君信仰为纽带的跨宗族跨地域的移民共同体组织。清朝末期, 萍乡地区社会动乱, 基层图甲组织破坏严重、移民群体被排除在本地以义祠为依托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之外, 在这一背景下, 地方政府以银子窝万寿宫的捐户群体为基础, 进行保甲组织的编排, 使银子窝万寿宫承担部分保甲组织社会治理的职能, 如清查户口, 编造户籍册、赋役收缴和地方治安等, 成为沟通地方政府与移民社会的重要纽带, 有力协助了清代萍乡地区的基层社会治理。

参考文献

- [1] 江立华, 孙洪涛. 中国流民史: 古代卷[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1: 60.
- [2] 周雪香. 明中叶闽粤赣边的人口流动与“客家”名称的出现[C]//族群迁徙与文化认同——人类学高级论坛 2011 卷. 2011: 12.
- [3] 黄德锋. 和谐有序: 民间信仰及道德教化功能探析——试以江西许真君信仰为例[J]. 中州大学学报, 2020(4): 57-61.
- [4] 何晶. 祭祀圈下村落共同体的融合[D]. 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 2018.
- [5] 寒季良. 同乡组织之研究[M]. 正中书局, 1946.
- [6] 何炳棣. 中国会馆史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7.
- [7] 凌焰. 粤东客家外迁萍乡研究——以上栗东源乡万寿宫为例[J]. 客家研究辑刊, 2016(1): 51-61.
- [8] 钟鸣凤. 萍北蔡氏续修族谱: 序[M]. 1915.
- [9] 郑锐达. 移民、户籍与宗族[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45-46.
- [10] 尚崇年. 萍乡县志: 卷一[M].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 18-19.
- [11] 何达峰. 萍北竹溪何氏族谱: 卷首[M]. 1999.
- [12] 顾家相. 励堂文集: 卷四[M]. 清光绪三十年(1904)刻本: 7.
- [13] 郑锐达. 移民、户籍与宗族[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160-161.
- [14] 许祖真君会册: 序[M]. 清光绪三十年(1904): 2-3.
- [15] 许祖真君会册: 条规[M]. 清同治八年(1869): 3-4.
- [16] 黄忠鑫. 晚清徽州保甲的官府推行与民间运作[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6): 39-51.
- [17] 许祖真君会册: 经理首事[M]. 清同治八年(1869): 8.
- [18] 许祖真君会册: 条规[M]. 清同治八年(1869): 5.
- [19] 许祖真君会册: 序[M]. 清同治八年(1869): 2.

[责任编辑: 王中兰]

The Formation of Immigrant Communities and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Qing Dynasty: A Case Study of Yinziwo Wanshou Palace in Pingxiang

XU Lili¹, LING Yan²

(1.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00, Hubei, 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Media, Pingxiang University, Pingxiang 337000, Jiangxi,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large-scale migration of Hakka people from the Fujian-Guangdong-Jiangxi region disrupted loc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structures, necessitat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s tailored to immigrant societies. In Pingxiang under Qing rule, traditional grassroots governance had relied on the *Tu-Jia* system (a local administrative framework). However, the collapse of *Tu-Jia* organizations and the exclusion of immigrant groups from the reestablished system created governance challenges. To address this, the Qing government institutionalized a new *Tu-Jia* order based on the self-organized immigrant community centered around Yinziwo Wanshou Palace—a communal hub for migrants. This adap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stabilized grassroots social order in Pingxiang by integrating immigrant autonomy with state-sanctioned administration. The case demonstrates how hybrid governance models emerged through interactions between state power and migrant self-organization during China's late imperial era.

Keywords: immigrant community; Wanshou Palace;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Tu-Jia* system